

# 王芸生陳布雷情結一生

□王芝琛

王芸生與陳布雷，各自所走的「政治道路」決然不同，本無相通之處，然而，冥冥中卻有一股割不斷的「情結」，幾乎伴隨王芸生的一生……

## 報壇憶舊

陳布雷原本也是報人，他主持上海《商報》筆政時，以「畏壘」為筆名撰寫社評，「議論周匝，甚負文名」。那時，王芸生就已對陳布雷懷有仰慕之情。陳布雷自1928年加入國民黨，當上了蔣介石的秘書長後，王芸生對陳布雷惜之、嘆之，也敬而遠之了。

### 惜之嘆之敬而遠之

然而，陳布雷一身布料長衫，一介寒儒，落拓不羈，在國民黨一群食官中，他清明廉潔，「獨樹一幟」。在王芸生的心裡，深深地埋下了對陳的「欽佩之情」。王芸生說：陳布雷為人謙和拘謹，待人接物，向無疾言厲色。每見陳布雷為蔣介石侍座，低眉垂目，斂手側座，必有詢問，才答數語。那種恭謹嚴肅的樣子，令人看了透不過氣來。」可能這就是那股割不斷的「情結」。

王芸生自走入報業，尤其進入《大公報》後，立意不涉足其他。用他本人的話說：「我服從司馬遷的一句話，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說，頭上已經戴上了新聞記者這個盆子，便看不見別的了。王芸生多次拒絕國民黨的「官銜」不在話下。

一次《大公報》剛遷入重慶不久，國民政府就給王芸生下了「聘書」，聘他為「軍委會參議」。「聘書」剛到，緊接著陳的電話就來了：「這是委員長的意思，請勉強收下吧，好在只是個空頭銜。」其實前幾次也都是「委員長」的意思，此次王芸生破例地默許了。可是，到了月底，「軍委會」竟給王芸生送去「薪水」，數目還不小，王芸生最後仍沒給陳布雷「面子」，將「聘書」和錢款如數退回。

1941年9月，《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去世，由王芸生主持筆政。僅在抗戰期間，《大公報》多次「碰牆」，這跟王芸生對蔣介石「不以為然」的態度

有關。1942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陷落香港，情況危急。這時，王芸生找到陳布雷請求營救。陳布雷旋告王芸生，說蔣介石已電告香港，胡政之可盡速乘機抵渝。但由港飛渝最後一班飛機降落時，並無胡政之的身影，只見大批箱籠、幾條洋狗和老媽子從飛機上下來，由身穿洋裝戴着墨鏡的孔祥熙二小姐接去。

### 抗議「飛機洋狗事件」

王芸生極為憤怒，在一篇題為《擁護修明政治案》的社評中給予了痛斥，社評不僅揭露了「飛機洋狗事件」，還點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利用公款購置私宅的醜行。社評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不滿。雖然蔣介石當即撤掉郭泰祺的職務，仍不足以平民憤。在遵義的浙大和昆明的聯大學生先後舉行示威，抗議「飛機洋狗事件」，甚至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

此時，陳布雷親自出面，請求王芸生寫篇社評，勸學生不要鬧事。王芸生在上的一篇社評發表整整一個月後，寫了篇題為《青年與政治》的社評，對學生進行了委婉的規勸。王芸生作此違心之論，固然有被巨大壓力所迫的一面，還有那無形的「情結」所趨，王芸生不忍陳布雷太「為難」。可作這樣的假設，倘若不是陳布雷親自出面，王芸生是否寫第二篇社評，當不可定論。

抗戰末期，湘桂潰敗，日寇長驅直入，直逼獨山。《大公報》反對國民黨「以空間換時間」的戰法，並同時籲請蔣介石到貴陽督戰，擊退日寇。同時，王芸生致函陳布雷，請陳布雷力諫蔣介石前往貴陽。不久，陳布雷給王芸生回函，卻是這樣的字句：「臣力已竭，丹心未死；仰首蒼穹，徒喚奈何！」「多麼悲！」「多麼悲！」事隔多年，王芸生仍發出如此感嘆。

### 瓶之傾垮惟壘之恥

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曾派其夫人宋美齡赴美國做「親善工作」。為此，



▲報人王芸生多次拒絕國民黨的「官銜」

王芸生曾打電話給陳布雷，建議是否上面應派孫夫人宋慶齡赴蘇聯訪問。可數日後，陳布雷回答曰：「完全不可能！」

內戰烽煙四起，國民黨接連「慘」敗，國統區人心浮動。蔣介石曾好幾次對陳布雷指示宣傳機要，其中蔣多次罵《大公報》，他說：「……譬如《大公報》，過去張季鸞主持，對抗戰建國的基本國策，盡力支持，在中央執行技術上則作善意批評，在社會上有中立聲望。張氏一死，王芸生繼主筆政，作風一變，由善意批評轉為惡毒諷刺。胡政之拿了國家津貼20萬美元，卻以中立姿態為共方張目。」「陳布雷知道，這樣報紙最能取信於社會。中間偏左，為什麼偏左了呢？他心中很茫然……」（見王泰棟著《陳布雷外傳》170頁）

實際上，陳布雷心中很明白，他自己就曾多次想「棄官投民」，重操報業。也或明或暗地向王芸生表露過。但那份頑固的「愚忠」，使他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曾親口對王芸生說：「我如同已經嫁了的女人，只能從一而終了。」王芸生還說：「他的『忠』，並非『忠』於國家，更非『忠』於人民，也非『忠』於他的黨，而是『忠』於蔣介石一個人。這樣『忠』是『妾婦之忠』。」

1948年11月14日清晨，南京城爆發一條驚人的消息，陳布雷自殺身亡

（起初只報心臟病突發）。陳布雷在遺書中說：「瓶之傾垮，惟壘之恥。」就是說，「上邊倒了，是我們下邊的罪過！」陳布雷在告蔣介石的遺書中說：「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無一毫其他私念。」「油盡燈枯」，轉眼間，陳布雷已成為「明日黃花」。得知陳布雷死訊時，王芸生已得到毛澤東口頭請柬，在香港候船準備北上。王芸生除了痛兮、惋兮之外，正嚮往即將到來的嶄新生活。

王芸生在評價陳布雷時說，陳布雷「自民國十七年加入國民黨，作蔣介石的秘書長，一連二十年，直到黨垮蔣敗之頃，仰藥自殺，一連二十年，伴蔣作幕，操筆為文，參與機密，始終當要津。蔣的文告，幾乎盡出陳手，大本《總統言論集》，每個字都是陳布雷吸紙煙嘔苦茶，從他的腦子裡擠出來的。」

陳布雷走了，王芸生呢？他十分清楚，陳布雷走的是一條錯路與死路。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未改，不想為官，文章報國，為《大公報》事業繼續奮鬥。他在題為《我到解放區來》一文（見1949年4月10日《進步日報》）開頭第一句話：「到解放區裡來，這在我個人生命史上是劃時代的。」他還說：「拋棄舊習慣，丟掉舊成見，一切重頭學，一切重頭幹。」喜慶之色，溢於言表。

當他還未踏上解放區土地，就得知《大公報》天津版在批判《大公報》的基礎上，易名《進步日報》，恰似「一聞棍」，喜慶變為「懊喪」。幸而周恩來召見並告知他，「上海《大公報》不必改名了，《大公報》還是民間報紙，你們自己經營，我們不來干預。」儘管後來《大公報》重慶版改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並易名為《重慶日報》。此時，王已感到「不幸中之有幸了」。

1957年「反右」鬥爭，王芸生沒有戴上「右派」帽子。他既感「詫異」，又感「慶幸」。

在號稱「滌蕩一切污泥濁水」的文化大革命中，《大公報》被「砸爛」了。「文革」後，所有在「文革」中被查封的報刊，毫無遺漏都復刊了，而惟獨《大公報》沒有復刊。王芸生看在眼里，悲於心中……

（摘自《王芸生與大公報》，中國工人出版社）

## 香港第一間電影製片廠

▲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影星陳思思

## 香江之最

雖然早在1930年10月，規模宏大的聯華影業製片印刷公司在香港成立，它的總管理處亦設在香港，可是它的行政及製作重心，是放在當時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上海。

聯華屬下的電影製片廠，最先成立的是設在上海的第一廠和第二廠。它們都是1930年末成立的。而聯華港廠（即聯華第三廠）則延至1931年初才創建。

聯華港廠的廠址，設在香港北角名園山，已停業的名園遊樂場。聯華又把粵劇場改建成一個電影製片廠。它是香港電影史上的第一個電影製片廠。名園遊樂場內還有不少亭台樓閣、假山、小瀑布等，聯華拍片時，把它們稍加改裝，即可作為外景場地。

聯華港廠是租來的，月租港幣二百五十元。1931年10月，聯華又將聯華港廠改為香港製片廠，把原有在上海的第六廠，改為第三廠。

聯華港廠的廠長是黎北海，基本編導有關文清、梁少坡和黎北海，攝影師是羅永祥，基本演員有黃曼梨和吳楚帆。他們都是按月支薪的，黃曼梨和吳楚帆的月薪都是港幣六十元。其他聯華的職員都是合約職員，依合約付酬勞。

聯華港廠的電影攝影機械，原是黎北海投資在香港影片公司的，後來移歸聯華港廠應用。這些機械，作為投資聯華的股本。

聯華港廠成立後，第一件工作便是設立聯華演員養成所。它亦設在聯華港廠內。第一期的畢業生，絕大部分加入聯華港廠，在幕前幕後工作。

聯華港廠一共出品過四部故事影片。它們是梁少坡編劇，關文清導演，石友宇、馮潔貞主演的《鐵骨蘭心》；羅明佑編劇，梁少坡導演，薛兆榮、黃曼梨主演的《古寺鴉聲》；曹學愚編劇，關文清導演，吳楚帆、唐醒圖主演的《夜半鐘聲》；關文清編導，吳楚帆、黃曼梨主演的《暗室明珠》。

聯華港廠開設了不夠兩年，在1933年初結束。主要原因是聯華經濟不景。

董事會決定撤銷上海以外的聯華機構，集中力量在上海製片。這個決定，曾遭到不少香港股東的反對，但無效。

（摘自《香港電影掌故》，廣角鏡出版社）

## 坐定粒六

□郁文

## 方言妙語

「坐定粒六」的意思是：肯定成功的，或是肯定這樣發展的。

例如：有朋友說：「我今天特意請你飲茶。」你可以說：「我早就『坐定粒六』你會請飲茶的！」

廣東人頗長時期受煙賭的毒害，不少俗語是由煙賭來的。這句話則是由賭博來。

賭具中的色子，又名骰（與投相同）子。相傳是三國時曹植所造，唐時加以改良。立體，正方形，方面，分刻一

、二、三、四、五、六等點數在上面。故六是色子中點數最多的一面。

色子的賭博方式，幾乎數之不盡，多數以點數多為勝，例如擲「侯六」（侯字只取其音，應該是什麼字形，又有什麼涵義，這些問題，都未曾研究過），除了「穿花」或者「位」之外，擲得六點就是最大的。

所謂「坐定粒六」，是把一粒（顆）色子中六的一面，穩定地安排着的意思，至於是指哪一種方式的色子賭博，就請恕我知得不清楚了。

（摘自《俗語拾趣》，博益出版社）



童真

□陳伯榮攝

# 圓明園歷史影像重見天日

□林鼎

## 神州大地

今年是圓明園罹難150周年。「殘園驚夢——奧爾末與圓明園歷史影像展」日前在北京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展出。

十二幀從德國人奧爾末圓明園玻璃底片沖洗出來的七十二幅大型原件照片，以及兩幀一百多年前的原玻璃底片，首次與公眾見面。據主辦方稱，在北京展出之後，這個展覽將移師東莞。

這十二幀玻璃底片是一百多年前由德國人奧爾末拍下的。奧爾末原為專業攝影師，約1867年在廈門開設了一家照相館，後來，他放棄照相館生意，轉到中國海關工作。

1873年，奧爾末任職北京海關時拍攝了這組圓明園的照片，距離圓明園被毀僅十三年。

學者考證，就目前圓明園歷史影像來看，奧爾末的作品是最早的。

後來奧爾末攜妻還鄉，於1927年過世。這組十二幀玻璃底片由奧爾末的遺孀交給德國學者恩斯

特·柏石曼。後來，中國學者滕固訪德時發現這批底片，十分震驚，借出這批底片到上海印製成《圓明園歐式宮殿殘迹》，為學界所重視。

後來這些底片運回德國，由於戰火的隔斷，底片的下落不被國人所知。有傳說其在二戰中被毀於戰火，增添了底片的神秘感。

這十二幀珍貴玻璃底片的收藏者、台灣學者秦風說：這批底片回到德國後，實際上並沒有毀於戰火，而是一直保存在柏石曼及其後人的手中。

1987年，柏石曼的孫子將底片賣給一位法國的收藏家，這批照片又「重出江湖」。

2009年10月，日本著名古籍書店有關人員將這批底片的消息告訴了秦風。

「看到這些底片的時候，心裡就知道，我一定要把它們帶回家。」秦風說，他用了整整三個月到處籌錢，終於搶在歐美一些圖書館和美術館之前，將這批珍貴的底片從東京「抱」了回來。

圓明園管理處副主任葉亮清介紹，這批照片的展出對於今後圓明園西洋樓景區的保護將發揮作用。建園前後，很多圓明園內的建築部件被人拉走作為建築材料或者裝飾用品，這些照片起到很好的例

證作用。通過照片就能知道，散落在外的哪些物件是當年圓明園內的，有助於圓明園文物的保護。

同時，在對圓明園文物進行修復的過程中，也可以參照這些照片盡量還原本來的樣子。

（摘自《老人報》）



▲重見天日的圓明園西洋樓景區歷史照片

## 抗日戰爭郵票

□施萍

1985年9月3日，中國郵電部發行了一套兩枚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郵票，編號J.117。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發動的世界侵略戰爭，後發展為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捲入戰爭的計有61個國家和地區，傷亡人數達5500萬左右。

1943年9月3日，意大利投降。

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簽署投降書。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八年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後勝利。

郵票中，上圖為國民黨二十九軍士兵衝鋒陷陣的場面。

背景是「蘆溝曉月」和橋上的石獅子。

下圖為戰士和民兵並肩戰鬥，英勇殺敵。背景是巍巍長城。



## 郵手好閒